

● 黎 鸣 主 编

ZHONGGUO·ONGGONHZ

中国的危机与

思考

ZHUANG ZHENG SHE JI
LIU FENG JIE

●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危机与思考

黎 鸣 主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25印张 4插图 373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1-00321-6/D·28

定 价：6.00元

序 言

一、悲 剧

生是一团火，死是一包灰，人类正是靠不断的死、不断的生来延续自身。明知死是任何人皆在劫难逃的归宿，可是人生之火还是要怀着不屈不挠的希望奋燃起。既知“悲”是宇宙中人生终极的命运，然而人类还是要以肃穆庄严的态度去孜孜探求人生在宇宙间的价值、意义和进程。对于所有这一切而有以再现的精湛的艺术作品，即为那常可震撼人心的伟大悲剧。

二、危 机

从西方到东方，从天涯到地角，生命之火到处在盘旋。盘旋是世间永恒而普遍的运动，也是人生命运之常态。有的盘旋扶摇直上，如展翅的雄鹰；有的盘旋颓然而下，象败翎的火鸡。人生的盘旋，趋而向上者，即逢良契；颓而向下者，即遇危机。危机、危机，纵有危险，也还有机会。人世间时常有马太效应：富贵者愈富贵，贫困者愈贫困；聪慧者愈聪慧，愚昧者愈愚昧；文明者愈文明，野蛮者愈野蛮，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似乎永远在把这种效应重复下去。往往是：人生、社会始终盘旋于良契与危机之间，富贵贫困、聪慧愚昧、文明野蛮并非人生、社会之命定。如果你是西方人，基督教圣经早就告诫你，上帝给予一切人

同等的恩惠，获良契者皆因于他的勤谨，他的敬业、创业热诚，他的对上帝的忠贞；而能奋力克服危机并终获良契者，则更能证明他是上帝真正的儿子。如果你是中国人，圣人的经典却早就给你教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央之国乃礼乐之邦，上智下愚，良契存于上上君主，危机寓于下下百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西方人的传统促使西方的人生之火盘旋而上，“好风凭借力，送我入青云”。中国人的传统致令中国的人生之火上下凌替，忽暗忽明，“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

三、悲剧危机意识

常存悲剧危机意识者常可超越生命的悲剧危机，致使一代代生命之火接连升起，不断焕发出人类理性的灿烂光辉。自吹自擂盲目乐观者则往往祸不远行，而且还祸不单行。西方文化迭有悲悯千古之智哲，时时代代不乏呼唤危机的社会良心（知识分子）；中国文化淡于悲剧色彩，更少危机的震聋发聩的理性呼唤。编者不才，宁冒天下之不韪，谨以《中国的危机与思考》告我九州方圆父老兄弟。

四、中国的危机

中国当代的危机，既沉积于历史，又起因于现实，既流布于心理、自然、社会各个领域，又纵深于现象学、生成学、结构学各种层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粮食紧缺等等，可以说构成了当前最直接、最紧迫的危机。然而，深沉的危机却是中国人心理的危机，道德、信仰、价值观皆濒于圯毁，社会进步之动力严重匮乏；最深远的危机是教育的危机，读书无用，厌学厌教，文盲泛滥，中国的未来确实令人忧虑。中国政治体制的危机则是因袭于历史传统的旧体制还在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中的陈旧、老

迈、反智、反自由、反民主、反科学、反现代化等弊端，有待进一步革除，因为这是中国社会常流于无序、常发生治乱极化的间歇振荡以至社会发展极其缓慢的总根。

五、编者碎语

本书的编纂自始至终是在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的赞助下进行的，撰写本书各个篇章的作者均为其各自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其中多数人事实上已经播名于海内外。作为主编者，我谨向他们全体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并藉此亦向一切关心本书内容的读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黎 鸣

1988.12.9. 于北京



主编简介

黎鸣，44岁，江西南昌人，1966年毕业于江西大学物理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获工科硕士学位（控制系统理论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社会控制论，信息哲学等研究，现为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并兼任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兼职教授，现已完成专著《信息时代的哲学思考》、《控制论与社会改革》、《信息哲学论》、《喜鹊与乌鸦——中西文化、哲学比较观》等。此外，还担任丛刊《二十世纪评论》主编，丛书《二十世纪学者文库》主编，译丛《SS文库》（性科学与性文化）主编。

目 录

第一编 危机意识论

- 第一章 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命运.....黎 鸣 (3)
- 第二章 “球籍”问题与危机意识.....黎 鸣 (9)
- 第三章 论预言.....黎 鸣 (16)
- 第四章 注意,西方的大“乌鸦”又在叫了.....黎 鸣 (22)

第二编 中国的危机

第一章 中国的能源危机

- 之一: 现实与未来.....李智盛 (45)
- 之二: 中国面临长期的能源问题.....王庆一 (63)

第二章 中国的生态危机.....徐寿波 阎 峰 (72)

第三章 中国的交通通讯危机.....廖小波 (83)

第四章 论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病及其

对策.....文贯中(102)

第五章 中国的工业企业问题

之一: 工业企业亏损势头严重不可掉以

轻心.....祁五官(111)

之二: 城市企业的结构性危机、消费扩

张以及中国社会体制的“影子重合”

.....温铁军(115)

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问题.....陶在朴等(119)

第七章 中国的小城镇问题

——论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过热现象

.....王 頔(128)

第八章 中国的人口危机.....周孝正(146)

第九章 中国人的道德危机.....王润生(157)

第十章 中国人的历史感问题.....吴廷嘉(170)

第十一章 中国知识界的病症.....郑也夫(181)

第十二章 中国的人才危机.....雷祯孝(194)

第十三章 论全面彻底地从实际出发.....远志明(212)

第十四章 中国的教育危机

之一：我们的困境和选择.....杨东平(220)

之二：教育与经济发展.....欧阳钟辉(239)

第十五章 法学的危机与重构.....张宗厚(254)

第十六章 中国文学之路探寻

——论中国文学的危机趋势.....李书崇(271)

第十七章 从“学好数理化”的历史命运看

当代中国文化的困境.....黎 鸣(287)

第十八章 中国的社会发展动力危机.....杨百揆(298)

第十九章 腐败与改革阻力.....孙立平(305)

第二十章 经济学家的滑铁卢.....黎 鸣(315)

第二十一章 中国社会改革的合法性危机.....李小兵(320)

第二十二章 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

——兼对十年浩劫的反思.....黎 鸣(328)

第三编 超越危机论

——社会改革理论的探讨

第一章 批判传统中国文化，树立人类现

代化社会公民文化的三大支柱——

自由、科学和民主.....黎 鸣(369)

第二章 社会改革与“爬山”.....黎 鸣(372)

第三章	社会改革与信息.....	黎 鸣(378)
第四章	社会改革与控制论.....	黎 鸣(383)
第五章	社会改革与系统理论.....	黎 鸣(392)
第六章	对解除社会危机的一些思考——评新 权威主义.....	陈奎德(405)
第七章	一个典型成功的社会改革过程的历史 理论实例剖析.....	黎 鸣(419)
第八章	论当前我国改革的出路.....	黎 鸣(464)

第一編 危機意識論

第一章 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命运

黎 鸣

(一) 知识分子的使命：开拓视野、战胜无知、 启唤悲剧危机意识

超越动物类，人类的大脑及其神经系统具有3大功能：体验、条理、直觉。相应于这3种功能人类具备3种力量：自然经验的感受力量、事物条理的稳定力量、类型直觉的洞察力量。在人类长期进化的历史中，经验的感受力量承担着人类向自然索取的职责；条理的稳定力量承担着组成社会的职责；直觉的洞察力量承担着开拓视野、战胜无知、不断向人类发出危机警告信号的职责。概而言之，这3种力量分别承担着维护人类生存、稳定、发展的三大天职。相应于这三大天职，人类社会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分别主要承担这三种天职的三类人，他们便是社会中的实物资料生产分子、组织社会的权能分子、洞察世事的知识分子。

由上所述不难设想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为人类承担开拓视野、战胜无知、不断发出危机警告信号的天职而奋斗不息。

(二) 知识分子的命运：痛苦之先觉，理性之前驱

人类始终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在不断呈现的悲壮的历史中艰难地向未来的文明迈步的，然而，最先感受到痛苦、并成为悲悯

千古的人物的却是知识分子。

在西方，知识分子最伟大最永恒的形象是耶稣。在他之前尚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在他之后则有但丁、莫尔、哥白尼、布鲁诺、弥尔顿、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卢梭、康德、马克思、尼采、斯宾格勒、爱因斯坦、凯恩斯、罗素、萨特……。千百年来，耶稣的受难形象激励着亿万人；而西方知识分子的悲剧危机意识则在不断演进的西方文明历史中逐渐焕发出伟大的理性之光——自由、科学和民主。

在中国，几千年来实质上并不存在知识分子，即使有，在中国大量堆积的史籍中，他们的名字也完全被帝王将相、官僚士宦们淹没了。

按照前文所述，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承担开拓视野、战胜无知、不断发出危机警告信号的天职而奋斗不息。中国几千年来不能说没有这种人，只可惜这种人在中国从来就难以生存。先秦春秋战国时代，或许还曾有可能，然而迭经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千百年来连连不断的文字狱，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早被改造成为为王权神授巧言舌辩、歌功颂德的文人行径。孔夫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取代了“开拓视野、战胜无知”，阿谀奉承、报喜不报忧的文人传统取代了悲剧危机意识，大量文人墨客、伪君子环围着当权者充当“喜鹊”喋喋不休鼓噪了几千年。

中国出现知识分子完全是近代的事情。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曾经一度出现耀眼的知识分子光芒，鲁迅先生是其中最为出类拔萃者。但是没有多久，知识分子又渐渐被消灭了，仍旧只剩下了中国传统的文人。及至近40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路依然是荆棘满布，危难重重。

可以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不过是先前西方知识分子命运的浓缩的重演。应该坚信，痛苦是会有报偿的，人类理性之光——自由、科学和民主绝对不会只照射西方人！

二

上面提到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为人类承担开拓视野、战胜无知、不断发生危机警告信号的天职而奋斗不息；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最先尝受人世间的痛苦，且自甘戚戚而为千古人类所悲悯。

从褒的方面看，可以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人类中勇敢的大智大慧、先知先觉者，是一些宁用自己的血汗乃至骨肉，心甘情愿经受狱火的煎熬而为人类做出理性的煲汤的圣者。

从贬的方面看，这些人是一帮无事生非、自寻烦恼、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的迂夫子。

仔细考察并比较中西方人类的历史，尤其近现代史，我们会极明显地看到，虽然知识分子均具有“无事生非、自寻烦恼”的“通病”，但中西方知识分子之间始终贯穿令他们烦恼不堪的问题的轴心却相差十万八千里。

西方的知识分子始终提防并不断为之苦思焦虑的是“一只无形的手”。这只“无形的手”其实就是宇宙的规律——自然进化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经济价值规律，等等，而这同时也即人类历史活动的统计平均的理性文明的轨迹。毋庸置疑，这只“无形的手”，当人们认识到它并从而重视它时，它实质上就是人类理性（或上帝）的化身；但当人们无知于它、无视于它、甚而一任自己的动物本能而无限膨胀时，它又显得是一个极其严厉的不断对人类的非理性加以惩罚的无情的地狱判官。

西方人类的知识分子殚精竭虑、不避艰险，宁冒“无事生非、自寻烦恼”的恶谥，苦苦要从这只“无形的手”的“无形”之中极力寻求到哪怕仅仅一点一滴、一层一次的有形的成分。正是因此，自然科学的规律被一个一个地不断揭示出来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经济价值规律被人们一点一滴地认识到了。仅就经济的价值规律而言，从亚当·斯密的纯粹经济人模型的“无形的

手”，到马克思的重视政治人模型而对纯粹人类理性计划经济的完全“有形的手”（决定论）的理想追求，到凯恩斯重视人类的社会文化心理模型而对“无形的手”和理想的“完全有形的手”的综合，再到目前西方人重新审视历史、对人类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心理的多元论模型的新自由主义探索，这一连串的思考寻求过程，我们很容易看到西方人类社会的进步，西方知识分子的“无事生非、自寻烦恼”实为人类历史的不断趋新、不断现代化的极有价值的创造。终于西方的知识分子们，在无形、从而无限的时间、空间的努力探索中有了奇效。在地球上的人类中，他们的智慧首先在辽阔无边的文化领域为人类创造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社会理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综合的近现代人类文明的系统。作为近现代人类社会的三种渐臻于完善的机能，自由、民主和科学可以原则地分别简明论述如下：

自由：

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宗教、道德、契约、法律……），平等地维护社会中一切人的独立地思维、表达、创新操作的权利，尤其是要注意保护人类社会中部分最脆弱的少数（思想领域中的离经叛道者、活动领域中的创造发明者，他们常常是人类中最没有地位的青少年），防止他们受到社会中多数人，其中又特别是专权的少数人的迫害。

凡能够更有成效地具备上述“维护”和“保护”机能的社会，即是更自由化的社会。

民主：

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宗教、道德、契约、法律……），平等地限制社会中一切人有可能对于别人的专制权力，尤其是要注意制止人类社会中最有可能擅权的少数（宗教领袖、部族头人、政府官员……），防止他们迫害社会中的多数人，其中又特别是人类中部分最脆弱的少数人（思想领域中的离经叛道者、活动领域中的创造发明者，他们常常是人类中最没有地位的青少年）。

凡是能够更有成效地具备上述“限制”和“制止”机能的社会，即是更民主化的社会。

科学：

科学是一种人类社会追求真理的机能。真理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时空系统，它永远呈现在人类的对于它的不断追求的过程中，它不可能被任何人绝对地表述，更不可能被任何人独断地占有。人类的科学要求人类永远在“提问→假设→实证”的不断地



循环探索中更新他们的现象描述、生成解释、结构再现。

凡能够更有成效地具备这种追求真理的机能的社会，即是更科学化的社会。

人类历史无可争辩地证明，西方的人类在先知先觉的西方知识分子的艰苦卓绝的献身精神的指引下的确已经创立了（并在不断加以完善的）以人类法律的无尚权威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和科学这三大近现代人类文明社会的机能。中国的历史同样无可辩驳地证明，虽然中国社会具有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历史，但确实迄今仍旧未能有效地具备这三种近现代人类文明社会的机能。

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苦思焦虑但却终究无可奈何地面对的是一只有形的手，这只有形的手实际上就是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经久不衰的人治的政府。这是一只有形的万能之手，但同时也是一只有形的无能之手。说它万能是因为它要控制管理社会中的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它无能是因为它实际上无视、甚而扼杀了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智慧，以至在迄今为止的近现代人类社会理性的系统中，中国人基本上毫无建树，既缺乏社会的“自由”机能，又缺乏社会的“民主”机能，同样也缺乏社会的“科学”机能。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这只有形的手所能做的根本不是什么认识或不认识，而只有顺从或

不顺从。顺从的可当御用文人、注经学者、甚或官运亨通，福禄寿三星高照；不顺从的只好自弃山野，向隅而怨、而哀、而泣，或铤而走险，依附叛民，揭竿起义、谋种王侯，终而至或者衣锦还乡，参与一新的人治政府，鱼肉百姓；或者惨死狱中，暴尸于市。久而久之，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自动丧失，甚至荡然无存。知识分子蜕变为无聊、无行、无脊梁的文人。“开拓视野、战胜无知”蜕变为“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断发出危机警告信号”的先知先觉蜕变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文死谏、武死战”的忠顺的奴仆。

马克思曾经把完全有形的手(决定论)当作他的理想的终极目标，但我们有必要指出两点；第一、马克思是在批判继承亚当·斯密的纯粹经济人模型的假定条件下的“无形的手”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他的完全有形的手(决定论)的理想的；第二、马克思的完全有形的手指的是纯粹人类理性条件下的全社会的计划经济管理的理想的社会管理方式。恰恰这两点在中国都毫无历史基础。中国的传统的非理性的有形之手戏剧性地戴上了马克思所理想的人类纯粹理性的完全有形之手的手套，历史与中华民族开了一个大玩笑。这大概就是人们所争执的中国传统的3千年与中国现代的30年之间的差异关系问题的实质。

正是因此，当西方的知识分子披荆斩棘、筚路褴褛而跃跃成为悲壮的人类理性前驱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左躲右闪、屈辱求存而悲哀地成了人类非理性的蒙难者。

谓予不信，如君真有诚意，不妨翻开中国全部历史，自己瞧一瞧！